

风物写意

英莲

■ 杨献平

那时候人们还都烧柴。每年暑假和寒假，总有一些时间，我要上山打柴。有时候和表弟一起。有时候和其他同学。打的柴火，大都是给爷爷奶奶的。爷爷四十多岁时眼睛再也看不到了，奶奶裹着小脚，做什么都不方便。山上更多的是黄荆，这种灌木，长势极快，越是割得多和快，就越是长得快，更加茂盛。

植物也和人一样，需要不断轮替和新生。暑假时候，我和表弟一人一把镰刀，早上起来就蹲在爷爷奶奶家门口，把刀刃反复地在磨刀石上磨，直到确认锋利，方才罢手。然后分别背上柴架子，迈着两条腿，穿过村子的石头巷子，一头扎进后山。站在沟口，目测哪里的黄荆多，就朝哪面坡上挺进。到近前，看到那些长势喜人的黄荆，浑身充满力气，放在柴架子之后，挥动镰刀，迅速向黄荆展开进攻。

孩子们都是一开始干劲足，越干越觉得累。饥饿不失时机，敌人一样偷袭肚子。饿得不行的时候，就得满山找吃的。山坡的悬崖附近，乱石较多的地方，总是有一种密集但颗粒小如红豆的果实，也像刚成形的车厘子，形状像是花朵，密密麻麻地结满了果实，而且也是红色的，黄红黄红的颜色，看起来很解馋。我和表弟一人揪住一棵灌木，松鼠一般一颗颗地摘了放进嘴里。

这野果略酸，成熟后，甜味占主体。果实不但小，还有核，很坚硬，一不小心，硌得牙疼。为了减少麻烦，我干脆嚼几下直接吞到肚子里去，心想，核吃去了也不要紧，反正能消化。大致因为这个习惯，到现在我吃西瓜葡萄，都不会吐掉核和籽。那果实虽然小，看起来不顶饿，可山里很多，吃得多了，也就不觉得饿了。我就和表弟开始捆绑割下来的黄荆，然后绑在柴架子上，背回去，放在爷爷奶奶家的柴火堆上。

因为带着叶子，都还青青，放几个月后，黄荆就干了，很好烧，即使下雨天，也不用专门的引火柴。还非常轻，适合奶奶抱来烧火做饭用。几乎每年暑假，我和表弟，都把为爷爷奶奶割黄荆当柴烧作为一件大事来认真完成，而在割柴期间吃的那黄红黄红的野果，也是少年时代最美好的记忆。但我一直不知道它叫啥名字，直到最近，方才得知，那野果名为英莲，也是一味中药，根茎、叶子、果实都可以入药，具有疏风解毒、清热、活血等功效。

文艺随笔

古人拜年

■ 赵柒斤

过年源于原始丰收的祭祀庆典，而拜年则延续了其社交功能。

作为岁首朝贺，秦汉以降，乃大盛。汉武帝太初元年（公元前104年）以正月为岁首后，“正旦朝贺”便成历朝历代朝廷大年初一的“保留节目”，曹植的《元会》诗描绘的就是君臣之间、官僚之间非常尽兴地开展春节社交的热闹情景。而民间春节社交往往以家庭成员、宗亲故友、左邻右舍等为主。

毋庸置疑，春节社交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“拜年”，且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。何谓“拜年”，明代苏州人陆容《菽园杂记》卷五谓：“京师元旦日，自上朝官，下至庶人，往来交错道路者连日，谓之‘拜年’。”清代苏州人顾禄记叙江南风俗的专著《清嘉录》解释得更细，说是江南人拜年，从大年初一开始，男女老少都换上新衣新鞋，走家串户，先拜本家本族长辈，次拜外亲，再拜朋友邻里，按关系亲疏依次相拜，甚至一年到头从不联系的亲朋也会登门拜贺。于是大街小巷出现“鲜衣炫路，飞轿生风，静巷幽坊，动成哄市”的拜年盛景。

然而，拜年固然可笼络感情，但太过频繁，又成烦心事。为解决这个难题，在没有电话、手机和互联网的古代，宋代人一般只亲自登门给“重要”的亲朋好友拜年，同时，采用投帖方式转达新年祝福，并延续至清代。南宋文学家周辉史料笔记《清波杂志》卷六曰：“正至交贺，多不亲往。有一士，令人持马衔，每至一门，撼数声，而留刺书以表到。”南宋另一位文学家周密随笔集《葵辛杂识》中记录了一件拜年趣事，说是周密的表舅吴四丈为人幽默风趣，春节时准备外送拜年帖，可家里没什人可用，“徘徊门首”，恰在这时，沈公子派仆人送拜年帖（吴四丈“漫取视之，类皆亲故”，于是“酌之以酒”，暗中将沈公子仆人要送的拜年帖与自己要送的拜年帖“掉包”，沈公子仆人不悟”，便“往遍投之”，收到拜年帖的人一看，是吴四丈“发”来的新年祝福，“相与一笑”，此事后来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。周密说，这并非他表舅的首创，北宋初的礼部尚书陶穀就干过这事。翻阅此故事时，觉得此行为比现代人转发朋友“新年祝福”玩得更有趣。

节日词语

母亲的斋菜煲

■ 韩巧夷

每年除夕，吃完团圆饭，母亲就开始操持初一的斋菜。海口有农历春节第一天吃斋菜的习俗，这习俗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得而知，据老一辈的海口人说，是祖上传下来的。那时的大年三十晚，有“守岁”一说，即全家人吃完年夜饭后，晚辈给长辈拜年，长辈给晚辈压岁钱，然后一家人喝茶聊天，聊到新年钟声响起，这时，家里的女主人把备好的斋菜盛到拜神的碟子里，摆到八仙桌上，还摆上酒、茶、饭、年果及香烛等，一家人叩头跪拜，祈求来年平安，诸事顺利。后来，拜神又演变为祭拜祖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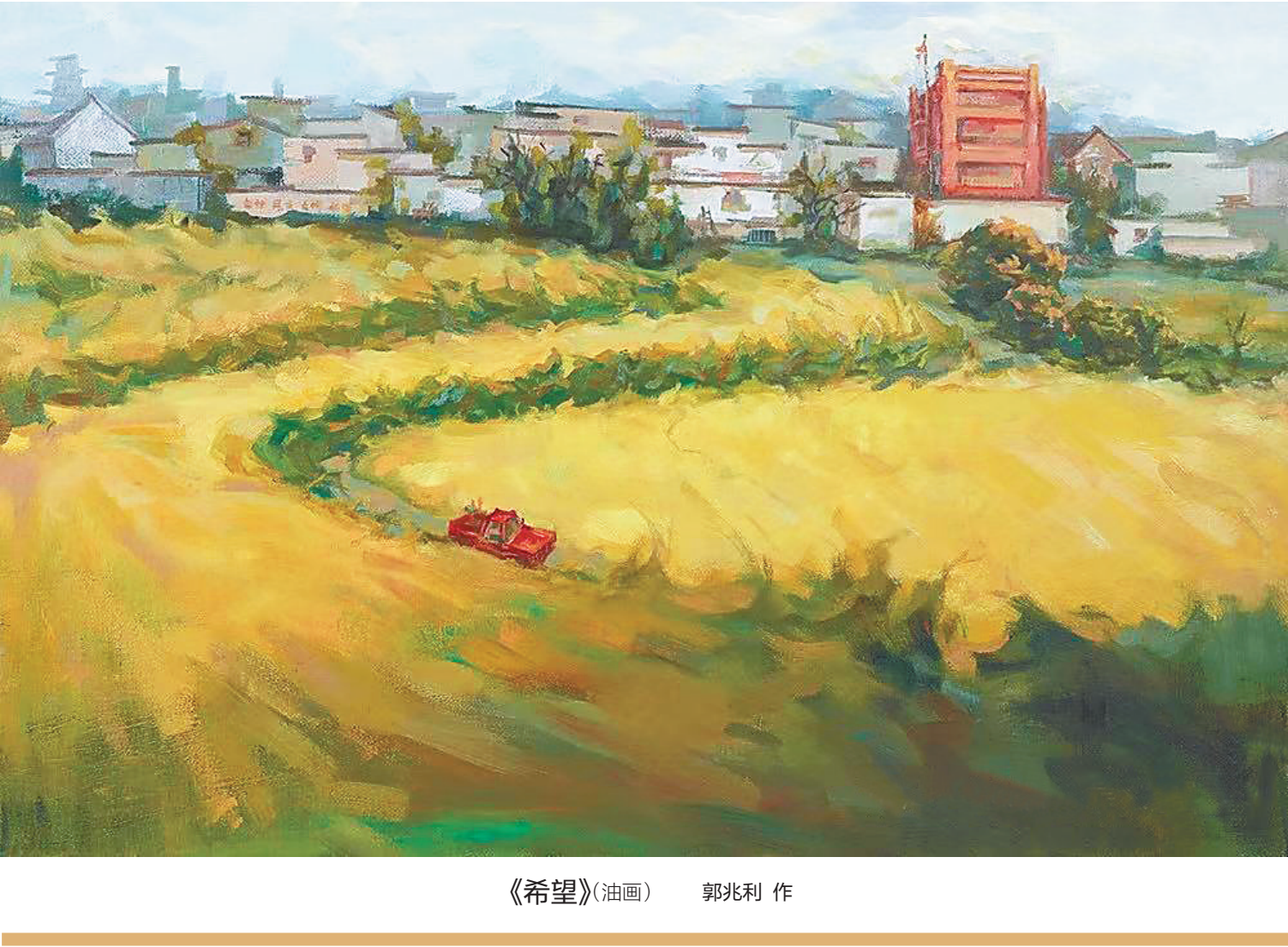
母亲是文昌人，说话文昌口音，但已在海口居住几十年，从住平房到住套间，跟大部分外来市民一样，没在海口的家里设神位或祖宗位，所谓的“守岁”，就是全家人守着电视看春晚，等新年的钟声敲响时燃放鞭炮。海口禁止燃放鞭炮后，就放电子鞭炮。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“守岁”，但在饮食上，母亲早已入乡随俗。年二十九前就备下的香菇、木耳、腐竹、粉丝、黄豆腐、黑豆芽、水芹、鲜芥头、甜菜等，这时都拿出来水洗、浸泡、沥水，粉丝除外。然后逐个单独炸或炒。香菇、木耳、腐竹、粉丝、黄豆腐是用植物油炸后捞起，黑豆芽、水芹、鲜芥头、甜菜是炒，油盐酱醋，样样不少。厨房小，母亲不让我们帮忙，或许，她更愿意独享制作斋菜的整个过程。我们都坐在客厅看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，客厅里，不时会听到“滋滋”的油炸声，闻到从厨房飘来的香味。

大年初一，应是一年中最为舒坦的日子，年前家里翻箱倒柜、角角落落都插翅难逃的大扫除，让整个家愈加整洁、敞亮和温暖。除夕饱餐一顿，晚上看春晚，物质、精神双丰收后，睡个懒觉很必然。而此时，母亲已在厨房忙碌，她一早起来煎年糕，冲上奶茶当早餐后，把昨晚炸、炒的食材放在一个锅里，倒入清水，加上些许的调料，煮沸，直至菜汤皆入味。

“吃饭了。”母亲喊。一家人于是围饭桌而坐，围炉吃母亲跨年度制作的斋菜。我舀一碗斋菜，那浮着一层金黄色油星的汤，喝起来油而不腻，香菇入口时溜滑，牙齿咬嚼时，蘸饱汤汁的菇肉及菇本身的香味，溢满口腔；炸过的粉丝顺滑，被炸得焦黄的腐竹、黄豆腐不软不硬，金针黄花菜、豆芽菜有嚼劲……多种菜肴综合而成的味道，在嘴里盘缠细品，回味的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鲜美。母亲吃完午饭后，去客厅看春晚重播，我又舀一碗斋菜。这一年一度的斋菜呀，吃得我酣畅淋漓，心满意足。

父母在，家就在。父母故，家便失了半壁江山。如今，每年大年初一，我也试着做斋菜煲，可是，同样的食材，同样的制作过程，却已没有母亲做的那种味道，这让我愈加思念母亲做的斋菜煲。

母亲O血型，做事干脆利落，敢做敢担，从她年轻时的照片看，着装有旗袍、西装；发式有三七短发、爆炸似卷发等，奔放又时尚，身上充满着浪漫的因子，据说，她相机都玩坏了几部。从小，她读书识字，练得一手好字，成年后，她一心只想握笔创作，通过戏剧指点江山，未曾想过要双手沾上烟火气味，故不曾煮过饭做过菜。年少时，她离开家乡，到海口就读南方大学



《希望》(油画) 郭兆利 作

人生况味

繁花消息

■ 周华诚

我们约在一座浩渺的湖边，以书的名义。朋友旭哥在湘湖边开了一家书院，一月八日这天请大家一起围炉煮茶，聊书聊城，聊聊当下的生活。我给曼冬打电话，曼冬说太好了，感觉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这样的聚会了。

曼冬是作协的秘书长，读诗、写作、出书，平时又做着一档荐书视频，粉丝众多。我有一个“稻田读书”文艺社群，也很热闹，往年呢，大家一起旅行，一起参加艺术节，一起读书分享聚会，活动一场接着一场。可是这两三年，多数的线下活动都取消了，大伙儿只能在线上相聚，时常是“云读书”或“云饮茶”。这回听说有这么一个线下的活动，都按捺不住雀跃的心情要来参加。

虽是腊月，却不觉寒凉，看了车上的温度，显示气温是十六摄氏度。这简直是春天了，百花都要被暖风催开了吧？大家在书院相见，个个喜气洋洋，先是相互问候“家里人都好吗”，然后隔着口罩相视而笑，眉眼都是高兴劲儿。

很快，五六十位朋友到齐，茶香袅袅中，久违的朋友得以重聚。上台分享者有三位，何兄最新的著作是《中国基本盘：未来工厂》。何兄是商业史学者，但他没有过多聊经济，而是聊自己最近在读的几本书，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《西西弗的神话》《鼠疫》。如今，生活需要一场重新开局，办企业也好，过日子也好，可能都要采取慢下来的节奏。信心比黄金更重要，未来的一切馈赠，都始于当下和现在。阅读和写作，是一件“知行合一”的事，尤其是在知识高度碎片化的时代，这是最好的学习方式。梁启超说，“凡人

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，生活才有价值。”人应该要活在趣味当中。

旭哥刚刚出了一本书《出圈》，讲他自己的人生经历与生活感悟。旭哥这个人有意思，本职工作是企业高管，又极热爱生活，出唱片、做主持、办书院，还制作访谈节目，客串大学教授，举办各种有意思的文化活动，也是一个跨界又丰富的人。他的分享，也就围绕着这本书，来聊他自己是如何成为一个“斜杠青年”，从而不断增加人生的宽度，拓宽体验的丰富性。

旭哥请我也做个分享，是因为我最近出了两本书，一本是《德寿宫八百年》，一本是《流水辞：遇见古老廊桥的隐秘之美》。德寿宫是南宋高宗赵构退位后居住的地方。我们知道，南宋都临安，也就是今天的杭州，凤凰山即曾经的南宋皇城所在地，但杭州最大的遗憾，在

海南分校，还没毕业就参加了土改，土改结束后被分配到银行工作。不久，她从银行转到某剧团当编导，再到一小工厂当业务人员，而后又办起了民营剧团……几十年在职场辛苦打拼，她不断变换职业，不断受挫，最终，她回归家庭，操持起了家务。她从不怨天尤人，看淡成败，从平凡生活中体悟家的重要。

中国人讲究风水，狭义地讲，就是住家的自然形势，如地脉、山水的方向等。具体地讲，就是所盖的房子，要处于依山临水的自然环境中。只是那年头，住单位分的房子，没得选择，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，教会了她对“家”的认知——人自身才是一个家最重要的风水，人没居山水中，但心中要有山水。有水流动的心田，温润、柔软；有江河大海的心胸，开阔、宽广；有山一样坚定不移的意志，牢靠、稳重……把山水的格局、真性浸入人的品格，就是最好的风水！自然有日月，家里有男女，家人和睦、顺畅，日子才过得有滋有味，此时，哪怕是身居陋室，也幸福。作为家中女主人的母亲，随着年龄的增大，越来越通达。掌勺后，母亲的厨艺日渐精进，最明显最隆重的，就是斋菜煲，它是一年一度的春节餐桌上的大菜、硬菜，那是经过时间的熬制，倾注情感做出的菜，就像人们对饮食赋予了文化，比如初一吃斋，来年不杀生，干干净净，即以清洁白来怀念祖先。就连斋菜里的食材，都有了寓意：如甜菜，寓意生活甜蜜；水芹，寓意勤劳肯干；长条状的黄豆腐，似金条，招财进宝等等，都是吉祥上进的意思。

母亲制作时的一丝不苟，炸、炒时掌控的火候及时间的控制，如餐馆的大厨，她对待做这道菜的恭敬心，不亚于在春晚上表演的演员，其中包含着对家人的爱，这种意味，岂是随随便便能做出来的？

尽管母亲一生经历坎坷，职业生涯起起落落，但她一直以她做事的专注与认真来影响我，使我做人做事都不敢马虎。“真诚做人，认真做事”的家传，让我终身受益。

那个时候的鱼鳞洲，一直在城市的边缘安安静静，好像几百年来就一直是这个样子，海军山上的哨所始终空无一人，因临海而立，潮声混着浪击礁石的迫切，显出这山的寂寥和孤单。那是海南很热闹的年代，唯鱼鳞洲仍旧安静，仍旧沉默着偏居一隅，仿佛在冷眼观望世事迁徙。多少岁月悠悠逝去，还不去的，是那鱼鳞一样鳞岬的礁石和粗糙的砂粒。

沿着鱼鳞洲的海岸线行走。二十年前，一条新修的柏油路蜿蜒入海，一路风景与海南东部截然不同，椰子树渐次减少，木麻黄、苦楝树随处可见。拐入一条土路，是仙人掌的天地。鱼鳞洲附近的渔民少，几个土石房随意地散落着。入口为一个方形的石砌小门，“鱼鳞洲”三个字已经斑驳，墙体在剥落，旁边的烈士纪念碑也很消瘦，海风常年呼呼作响，一种奇异的悠远的调子。远了些，看去，鱼鳞洲一面连着陆地，三面环海，地形是一座裸露着岩石的丘陵。岩石长得重重叠叠，阳光折射后，灼灼生辉，果真状似鱼鳞。

那一年，我们没找着古诗里的“泉流一井”。

史料记载，1939年7月8日，日本海军横须贺第四特别陆战队攻占八所。1941年3月，日本侵略军为了掠夺海南石碌铁矿和旧日村岭的珍贵木材资源，诱骗、强抓、押解中国劳工和盟军战俘开始修建八所港和石八铁路。至1943年4月建成。日本侵略军为抢建八所港需要石头，不惜疯狂地用炸药炸掉鱼鳞洲的山崖取石，山体被严重破坏，山体环境发生变化，原来一直不曾干涸的百年石井也消失不见了，仿佛以此明志，以对抗侵略者。

鱼鳞洲、八所港、死难劳工纪念馆，都是日军侵华罪行的历史铁证。

这些罪证埋进岁月深处，在这片土地上生了根。1957年，八所港在经历了无数风雨之后，得到一些恢复，毗邻的鱼鳞洲也开始建设起来，从山脚到峰顶砌上水泥台阶。1964年，又在峰顶建起瞭望台（灯塔）和航标灯——幢白色的圆柱建筑，孤独地站在鱼鳞洲之巅。它就像是这片海域里的“文明世界”，让渔民和航海者都趋之若鹜。这些创建，在历史上都有特别的意义。

2003年，山顶航标灯塔改造为仿古式灯塔，灯高62.9米，塔高18.6米，航标灯昼夜自熄自来，每6秒闪白2次，射程18海里。它是北部湾重要的航标。

2011年，东方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，鱼鳞洲军堡被列为东方市不可移动文物。

其实，从远古时代开始，灯塔就是代表它们所在城市的军事和社会经济力量的元素之一。几个世纪以来，它经历了许多次变身，从明信片、模型、邮票到绘画、电影、诗歌和小说，它常常被视为孤独的象征。诗人们更是发挥了无穷的想象力，将灯塔称为“波浪的牧羊人”或“岩石的王子”。

鱼鳞洲上的灯塔，遵循着世上最古老灯塔数千年来的旋律，每走一步都会打开不同的大门，把人们带进远古时空。鱼鳞洲上的这座灯塔，讲述的是海南西角历史上诸多的故事，每个故事都像摇篮曲一样，有着最原始却最明亮的温暖。

这一天的读书活动，其实还有很多有趣的内容，昆曲，评弹，煮茶，甚至精心设计的长桌宴。青菜和萝卜来自原生态的田野，花朵与美酒一起在餐桌上绽放欢颜。朋友们开始碰杯，甚至放声歌唱。想想看，有多久没有这样的活动了呢？心灵的负累多了，封闭久了，轻盈和诗意的部分早已被琐碎的日常抛下。如曼冬所说，似乎这一天的聚会，就是一次“重启”，接下来的日子，将要重新起舞。而我的感受，这是一场提前到来的春日雅集，一场春天的开场白，早早预告了繁花消息。

烟火珠崖

灯塔

■ 伊拉

海南东方市鱼鳞洲的历史，可以从史料记载中追溯至明朝。在明孝宗弘治七年（公元1494年），海南卫指挥使张瑄无意中发现了这座石山，这里独特的地理位置让张翊兴奋不已。他随即在此设立鱼鳞洲军堡，并派兵60人驻守，以防御倭寇和海盗。对于曾经驻守过海军部队的鱼鳞洲，人们出于朴素的情感，有时会称之为“海军人山”。大概“海军人山”从字面上便有一种安全感，它后来几乎成为鱼鳞洲在人们言语中的代称。20世纪90年代，我读中学时，我们的作文里出现得更多的，也是“海军人山”，而非鱼鳞洲。

鱼鳞洲久负盛名，在清康熙四十年（1701年），它就被列为海南八景之一。清代唐之莹曾特别赋诗赞誉：“鱼鳞高耸接云烟，策杖登临别有天。怪石回环看不厌，奇峰重叠翠相连。泉流一井清如许，浪击千层势欲颠。海上三山何处觅，分明此境是神仙。”诗中的“泉流一井”是指鱼鳞洲一口十分神奇的石井，民间传说中，几百年来，此井常年泉水不涸，清甜爽口。

少年时代，鱼鳞洲是我们寄寓梦想的所在。站在山顶上，听风呼呼地刮过耳旁，便能生出如曹操一般“登临碣石，以观沧海”的喟叹。我们在山下的木麻黄林中辟了一块空地，野炊。三块晒干了的礁石垒成灶，同学从家里拿来一口不小的铝锅，水扑哧扑哧地往外冒泡，把锅盖都顶了起来。大家欢天喜地地从锅里捞出汤圆，一些汤圆裂开了口子，甜的芝麻汤汁流出来，落了锅里，锅里便成了流动的水墨画，把鱼鳞洲的影子都收录其中。

那个时候的鱼鳞洲，一直在城市的边缘安安静静，好像几百年来就一直是这个样子，海军山上的哨所始终空无一人，因临海而立，潮声混着浪击礁石的迫切，显出这山的寂寥和孤单。那是海南很热闹的年代，唯鱼鳞洲仍旧安静，仍旧沉默着偏居一隅，仿佛在冷眼观望世事迁徙。多少岁月悠悠逝去，还不去的，是那鱼鳞一样鳞岬的礁石和粗糙的砂粒。

沿着鱼鳞洲的海岸线行走。二十年前，一条新修的柏油路蜿蜒入海，一路风景与海南东部截然不同，椰子树渐次减少，木麻黄、苦楝树随处可见。拐入一条土路，是仙人掌的天地。鱼鳞洲附近的渔民少，几个土石房随意地散落着。入口为一个方形的石砌小门，“鱼鳞洲”三个字已经斑驳，墙体在剥落，旁边的烈士纪念碑也很消瘦，海风常年呼呼作响，一种奇异的悠远的调子。远了些，看去，鱼鳞洲一面连着陆地，三面环海，地形是一座裸露着岩石的丘陵。岩石长得重重叠叠，阳光折射后，灼灼生辉，果真状似鱼鳞。

那一年，我们没找着古诗里的“泉流一井”。

史料记载，1939年7月8日，日本海军横须贺第四特别陆战队攻占八所。1941年3月，日本侵略军为了掠夺海南石碌铁矿和旧日村岭的珍贵木材资源，诱骗、强抓、押解中国劳工和盟军战俘开始修建八所港和石八铁路。至1943年4月建成。日本侵略军为抢建八所港需要石头，不惜疯狂地用炸药炸掉鱼鳞洲的山崖取石，山体被严重破坏，山体环境发生变化，原来一直不曾干涸的百年石井也消失不见了，仿佛以此明志，以对抗侵略者。

鱼鳞洲、八所港、死难劳工纪念馆，都是日军侵华罪行的历史铁证。

这些罪证埋进岁月深处，在这片土地上生了根。1957年，八所港在经历了无数风雨之后，得到一些恢复，毗邻的鱼鳞洲也开始建设起来，从山脚到峰顶砌上水泥台阶。1964年，又在峰顶建起瞭望台（灯塔）和航标灯——幢白色的圆柱建筑，孤独地站在鱼鳞洲之巅。它就像是这片海域里的“文明世界”，让渔民和航海者都趋之若鹜。这些创建，在历史上都有特别的意义。

2003年，山顶航标灯塔改造为仿古式灯塔，灯高62.9米，塔高18.6米，航标灯昼夜自熄自来，每6秒闪白2次，射程18海里。它是北部湾重要的航标。

2011年，东方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，鱼鳞洲军堡被列为东方市不可移动文物。

其实，从远古时代开始，灯塔就是代表它们所在城市的军事和社会经济力量的元素之一。几个世纪以来，它经历了许多次变身，从明信片、模型、邮票到绘画、电影、诗歌和小说，它常常被视为孤独的象征。诗人们更是发挥了无穷的想象力，将灯塔称为“波浪的牧羊人”或“岩石的王子”。

鱼鳞洲上的灯塔，遵循着世上最古老灯塔数千年来的旋律，每走一步都会打开不同的大门，把人们带进远古时空。鱼鳞洲上的这座灯塔，讲述的是海南西角历史上诸多的故事，每个故事都像摇篮曲一样，有着最原始却最明亮的温暖。

